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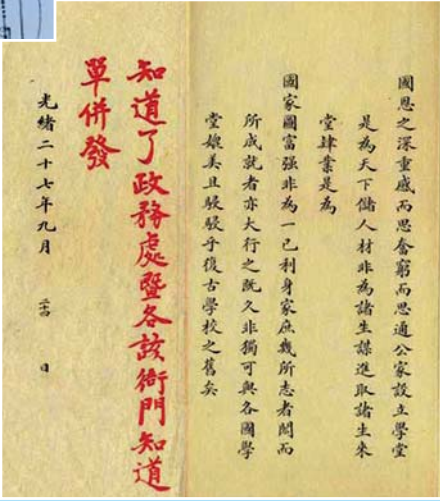
【史海钩沉】

清代末任山东提学使方燕年



◀方燕年画像。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下旨礼部:“今天下初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其中“兴文教”表现在重视科举,通过给汉人更多做官机会来笼络汉人学子和人心,惟此方能“开太平”,方能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具体做法是在十八行省增设“提督学政”一职,简称学政,俗称学台,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学政的职责是“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按期巡历所属各府、厅、州,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

清初对担任学政者要求很高,非才学、品行俱佳者不能担任,顺治帝明确要求“以各部1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山东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文脉悠长,学人辈出,学政更属优中选优,清朝前期多由江浙优秀才俊担任。

清朝各省均在子、卯、午、酉年份农历八月中上旬举行乡试,正副主考官均由皇帝选派,本省籍人士既不能担任本省乡试正副主考官,也不得担任本省学政,目的是避嫌和防止作弊。为适应乡试要求,学政每届任职三年,期满调任,且多在乡试前一两个月调离。

根据王实甫《清代官职年表》一书记载,清朝一代担任过山东学政者约120人,多半不到一届即调离,只有赵佑从1781年至1786年任职六年,这种情况颇为罕见。清末方燕年虽进士出身,以候补道身份担任山东提学使,但这种情况在清代中期以前很难出现。

方燕年(1872-1942年),字祈叔,号鹤人,安徽省定远人。方燕年出身大户人家,算得上名门之后,其祖辈曾任两淮盐运使等重要职务。方燕年从小受家庭熏陶,熟读四书五经,研习碑帖,一路考秀才中举人,清光绪己丑年(1889年)27岁时中进士,次年参加光绪庚寅科(1890年)殿试,登进士二甲84名,此后开启官宦生涯。清末,方燕年在山东任职主要集中于文教领域,他先后担任四个学校总办(监督)一职,率齐鲁学子留学日本等地。

堂首任总办一说,方燕年任职也仅到1902年末,在任亦不过半年。虽然三人任职总办时间不长,但对大学堂初期规划和建设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东大学堂设立师范馆,次年(1903年)9月10日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停办,在泮源书院原址成立山东师范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习、管理员为宗旨”,方燕年任监督,山东大学官网对此有介绍。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大学堂迁至济南杆石桥新址,更名山东高等学堂,陈恩焘任监督(1904年后学堂管理总办改监督),1905年离任。

清政府为“广储(法政)裁判人才,以备应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各省相继建立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山东巡抚杨士骧和提学使连甲在济南北察院街路北的皇华馆创设山东官立法政学堂。方燕年与杨士骧系安徽同乡,两人相熟,且方燕年又有担任山东大学堂、山东师范学堂总办的经历,故被任命为山东官立法政学堂第一任监督(1926年,山东官立法政学堂等六所专门学校合并为新的山东大学)。1907年后,方燕年又调任山东巡警学堂任监督,山东巡警学堂1903年5月在后宰门成立,原为山东警务学堂,1906年更名。换言之,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五年间,方燕年先后担任四所(大)学堂实际校长一职,此番经历可谓前不曾有古人,后恐亦无来者。

清末在文教领域的新政除“改学堂,停科举”外还有一项“奖游学”,此举旨在鼓励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制度、教育等,师西人长技以图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清政府专门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学业有成获得毕业证书并归国者分别给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奖励,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者则与官派同等对待。清政府原本将留学生派往欧洲的英、法等国,但因距离日本更近、费用较省且传习相对容易等原因,各省学子大都优先选择留学日本。

同年,山东巡抚周馥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肄业者人数无多,将来学成回东不敷分布”为由,派方燕年带领55名山东学生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学生分为速成、长期两班,速成班39名学生,至1904年4月学成回国,长期班的16人仍留东京继续学习”,随后山东留学日本的学生逐年增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又“从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及各州县学生中选派40人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特拟再派官绅各二十人,学生四十人派往日本游学”。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山东官派留学生分别超过100人、300人、600人,20世纪初山东留洋人数在此期间达到新高。据《山东省教育大事记(1840年—1990年)》载,方燕年还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度出国考察学务,但出使国家、具体行程暂无确切史料确认。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为适应新政对传统官制进行了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国子监,设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除了施行260多年的“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山东最后一任学政戴昌和各省学政依清政府统一要求“回京供职”。自1906年至辛亥革命“提学使”后一职被废,五年时间里连甲、朱益藩、罗致钧、陈荣昌、方燕年先后(署)任山东提学使——1911年1月21日,方燕年以候补道身份署理山东提学使。事实上,方燕年作为清末最后一任山东提学使,在职时间不足一年。进入民国后,方燕年曾在工商界出任高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病逝,享年70岁。方燕年任职总办、监督、提学使或率团留洋,每次任职时间短则几个月,长也不足一年,这多半是由政局不稳、时代紊乱造成的,为时代洪流裹挟非本人所能决定。

在清朝,多位山东学政或才学超人者或留有政绩,或奖励士子或提携后人,留下诸多佳话,但方燕年未曾任督抚藩台等地方大员,《清史稿》等对其未有记载,后人对其了解甚少,但从1901年至1911年10年间,方燕年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堂、山东师范学堂、山东官立法政学堂、山东巡警学堂总办(监督)一职,尽力“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为近代山东法政等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通过带团留洋、出国考察传播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为20世纪初初期山东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故地往事】

1919年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张知非

1919年4月,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教员张承荫利用春假时间,自筹资金,南下考察各地师范教育及女子教育,其关注的重点为山东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务、学业、成绩、图书、讲演及学校建筑等事项。其中,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便是其考察的第一站。

当年4月6日下午1点,张承荫根据所了解的信息,赴济南东流水(今在五龙潭公园内)参观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但到了此处,才发现校址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通过与校役交流得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原清末山东女子小学堂,后改为山东官立初级女子师范学堂、山东女子师范学堂)已与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合并,命名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毛家坟(位于济南南关全胜街),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则迁至他处。于是张承荫又乘车至毛家坟,准备拜见女师校长。时至清明节假期,校长周幹庭不在学校,由教员孙致斋介绍相关情况并陪同参观。

由孙致斋作引导,张承荫参观了女子学校的校舍。虽然校舍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教室、寝室、图书室、阅报室、自修室、礼堂、游戏场、凉亭等。教室的墙壁选用浅蓝色,张承荫认为“甚好,颇能养护目力”。教室的房顶由芦苇建成,冬暖夏凉,在芦苇顶上覆瓦,可避风雨。教室内未悬挂钟表,但有座位表,墙壁上挂有团体褒奖状,由校长奖励给勤奋用功而绝少请假的班级。寝室每间住两人,大者住四人。学校礼堂不甚大,内悬校训一则,为“勤肃敦睦”,图书室中的书籍和阅报室内的报纸不多。游戏场上有秋千架,学生手植樱花30株。

张承荫了解到,山东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周幹庭(树桢),山东安丘人,清末拔贡,日本速成师范卒业,曾充崇实女子学校教员及第一师范监学,在女师教授习字。龚筱兰女士担任女师学监兼教务主任,教授修身课。孙致斋为师范讲习所毕业,教授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及算术等课程。据张承荫记载,该校男教员多、女教员少,级主任多由男教员担任。学校共292名学生,全年经费共34318元,其中师范学校30936元,附属小学3382元。校长的薪俸为每月85元。

张承荫对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五项“自动事项”很感兴趣:国文研究部、炊事部、书报部、贩卖部、运动部,均由学生自我管理,学校学生自治、自管的色彩比较浓厚。张承荫认为,女师的炊事部与贩卖部之全胜商店为“最生色者”,并详细记载这两者的具体运作流程。

其中,炊事部由各年级学生自炊自食。每个年级设立炊事长一人、会计一人。炊事长负责管理仆役,主持烹调事务。会计负责本年级伙食费管理,账目每月整理公布一次。女子师范学校位于南关全胜街,因此学校的贩卖部称作全胜商店,纯按商业性质办理。

在张氏看来,全胜商店由学生管理,既可以以较低成本提供学校日常用品,又为学生提供练习商情的机会,诚一举两得之事也。学校商店的具体经营方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每股一吊文,共招股三百吊,总额为300吊文钱。商店账目每日一结,每学期一总结,除去成本开支,盈余作为红利。据账目记载,全胜商店开张以来,所获颇丰。以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底为例,除商店所存货物不计外,共得红利四十五六吊,其中,以两成作为商店修缮费及运输费,剩余八成有股东分红,每股得铜元13枚,约利息3分。

张承荫认为,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幹庭先生在语文尤其是作文教学方面“多有发明”,如《作文后热度涨落表》。其中,第一个表格中标注学生写作文后的热度变化情况:“作文第一日极高,第二日渐低,第三日又低,第四日更低,第五日甚低,第六日极低,第七日由低至于无”。基于此,周幹庭主张根据学生的热度情况变化,及时批阅作文并反馈给学生,宜早勿晚、宜速勿迟,“乘其热度未落,批评之佳者,鼓励劣者,知羞耻矣”。

据孙致斋介绍,该校校长周幹庭于当年(1919年)2月曾提议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女子师范联合会,认为积极发展女子教育正当其时,主张联合临近省份之女子师范学校开会研究,“不特获交互参观之益,并可谋将来改良之方”。张承荫还在学校看到周校长起草的《宣言书》及《简章》。由此,张承荫对周幹庭校长大加称赞:观于以上二表,则知周校长对于管理、教授,均有发明之力量。观于提倡女子师范联合会及简章,又可知周校长对于女子师范教育有积极进行之心愿。

张承荫到女子师范时,正值清明节,学校停课一日,未能见到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教员及教学情况。但学校的建筑格局、教师教学方式、学生自治方式等给毕业于北洋大学堂附设师范班的张承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氏发出感慨“吾知该校之进步正未有已也”,对山东女子师范学校的发展充满期待。